

刘东 主编  
周文彬 总策划

POLITICS IN CHINA

# 中国政治

〔美〕詹姆斯·R·汤森  
布兰特利·沃马克 著

顾速 董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治/[美]汤森,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

1版.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A Country Study:Politics in China

ISBN 7-214-01284-7

I.中... II.①汤...②沃...③顾...④董...

III.①政治-研究-中国②现代化-研究-中国

IV.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1121号

### A COUNTRY STUDY

#### Politics in China

Third Edition

by James R. Townsend

Brantly Womack

Copyright 1986 Lytle, Brown and Comp any

- 书 名 中国政治  
著 者 [美]詹姆斯·R·汤森 布兰特利·沃马克  
译 者 顾速 董方  
责任编辑 余孟仁 王楠 花蕾  
责任监制 蒋子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人民印刷厂制版分厂  
印 刷 者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284-7/Z·87  
定 价 19.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 目 录

## 第三版作者序 / 1

##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 / 1

中国政治的背景 / 1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 / 8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 / 13

中国政治中的多样性与变革 / 20

##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 / 23

中国政治传统 / 25

革命的背景 / 33

苏联共产主义 / 43

中共历史 / 51

结论 / 59

## 第三章 政治构架：机构与政策的演变 / 61

### A. 政治机构 / 62

中国政治组织的常量 / 62

中国共产党 / 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 / 69

群众组织 / 73

### B.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 / 75

重建时期(1949—1952) / 75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 78

大跃进(1957—1960) / 81

2 中国政治

- 调整和恢复(1961—1965) / 85
-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 88
-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毛泽东以后时期(1976—1985) / 94

**第四章 共产主义体制:意识形态与变革 / 102**

- 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思想 / 104
- 毛泽东思想的结构特征 / 109
- 循环变化 / 115
- 世俗变化 / 120
- 中国制度的属类问题 / 129

**第五章 政治社会化与传播 / 132**

- 革命价值与继承下来的政治文化 / 132
- 社会化的推动因素 / 139
- 社会化与“文化大革命” / 160
- 1976年以后的社会化 / 163

**第六章 政治利益、录用和冲突 / 168**

- 群众利益表达 / 170
- 政治录用 / 180
- 精英冲突 / 198

**第七章 政府过程 / 212**

- 过程的总体考察 / 212
- 决策 / 218
- 行政管理 / 225
- 规则的执行与判决 / 234
- 外部对过程的影响 / 242
- 结论 / 249

**第八章 从毛泽东主义到现代化:**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252**
- 毛泽东主义模式的命运 / 253
- 对革命时代的评价 / 259
- 出现的问题 / 268

**译后记 / 276**

## 第三版作者序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其缔造者一代人曾全心关注的革命范围。当然，政治生涯横跨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的那些领导人仍然活跃着。毛泽东以后，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邓小平是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毛泽东于 1935 年取得对党的控制权之前曾与其密切共事，并参加过史诗般的长征。但至今仍活着的老一代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首先关心的是在稳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下促进中国的繁荣。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特别注重强化体制和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他正在利用他的余年和个人权威推动法制，使国家机构的行政职能和党的直接控制区别开来，并要求党为现代化的需要服务。他十分重视权力的平稳交接，可以从他提拔了若干新人到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以及在更一般的层次上鼓励整个制度启用较年轻和受过较好训练的干部等方面得到证明。

在邓小平的护卫之下，新的领导层在改革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促进现代化方面越来越大胆。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控制的普遍放松。私营经济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几近灭绝之后又一次复苏，企业被授予多得多的自主权，中国街头的生清是早年的革命清教主义放松的明证。当然，有些方面仍然没有放松。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党内纪律和惩罚罪犯。而且，机构和程序得到了改革，被赋予了新的活力。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保证现行的改革将会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在最高级别上，这种关注可以从 1982 年宪法的通过和法律职业的发展看出来，而且它还以长期生产合同制形式影响了农户的日常生活。最后，从外国观察者来看，最明显的政策变化是实行新的国际开放，这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和迅速增大的外国投资数目，也把成千上万名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国家留学。

与此相悖谬的是，毛泽东以后政治的稳定性和其政策关注的正常化

(按照西方标准)却对人们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造成了困难。毛泽东以后时期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延续性何在?在多大程度上现行政策是回到了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目前在农村地区的非集体化政策是不是对50年代早期土地改革以来农村政策的根本的和永久的否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认真地对比研究中国政治的过去和现在的各个阶段。

人们容易作出这样的设定,即中国政治的现行政策可以在政治上自成体系,无须去认真地考察早期的阶段。这种设定还得到了中国政治口号的支持,它一方面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强调已达到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时期。然而,应当记住,“文化大革命”也曾宣布完全否定以前的时期并承诺了一个永远革命的新时代。在回顾历史时,简单地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来解释中国政治显然是过时而天真的;而仅仅用现行政治来作解释也有问题,这主要并不在于现阶段会变化,因而使人们的分析不着边际,而在于任何一个新阶段的起点都是以前阶段的经验、政治行为和观念。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以后时代的区别,但只有从历史的关联中才可理解这些区别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政治行动者来说,这种关联属于个人经验,无需去条分缕析,但局外的观察者必须经常地问自己:这种历史关联如何构造了政治行动并赋予其意义?因此,《中国政治》第三版的首要任务是寻求对中国政治的整体理解,它对于其历史延续性以及1976年以后的变化都同样具有敏感性。

要理解变动着的中国政治制度,从事分析的人本身也应该有相应的变化。《中国政治》第三版的重要变化是布兰特利·沃马克作为合作者的加入。我们相信自己对这一题目更新了的观察能在几个方面改进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也是最明显的革新是收入了截止于1985年中期政治的新材料,我们重新考虑了每一章的问题,并根据毛泽东以后政治的第一个十年的发展重新构建了某些章节。例如,对政治组织的讨论不仅考虑了1982年的新党章和新宪法,而且在第三章和其他地方较多地注意了毛泽东以后时代所强调的制度化、法律和社会主义民主。第二,像这样一部概览的书十分依赖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质量,我们在分析中加进了学术界同仁的许多重要的新成果。第三方面的改进得益于大大改善了的来自中国的资料和观点。近年来中国的信息资源在量和质上都有了重要的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第三版的材料基础。这可以从讨论传播媒介的第五章等章节中看出来。

由于诸多学生和学界同仁对《中国政治》第二版的评论,本书第三版受益匪浅,我们希望读者继续为本书的未来修订版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特别感激洛威尔·迪特默尔对本书初稿所作的内容广泛的评论。我们也感

谢约翰·弗兰肯斯坦为本书第二版所写的说明。我们还要感谢切里尔·富勒对本书娴熟的文字处理。最后，我们要感谢支持并协助本书得以完成的另外几位人士：白鲁恂（《比较政治学丛书》本册之学术编辑）；小布朗出版公司的约翰·柯韦尔和巴巴拉·布里斯；出版服务部的特里·吉特勒和卡瑟·洛克曼。当然，本书所有的差错和缺点概由作者负责。

#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

## 中国政治的背景

### 革命的背景

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它至少跨越 1911—1949 年这样一段时期，并且经历了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用暴力推翻政治制度的事件。1911 年的第一次革命推翻了已统治国家数世纪之久的王朝。第二次革命在 1928 年达到了高潮，它建立了国民党领导下的新的中央政府，以一种更有朝气、更有组织和一党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取代了民国早期的多头“军阀”统治。1949 年，第三次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标志着共产主义体制的出现。

这种描述尽管涵盖很广，但仍然不能确定中国革命时代的跨度。推翻国家政治体制及其精英层的一系列成功努力，推出了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个决定性的高潮，然而，这些高潮并不必然标志着革命过程本身的界限。在中国革命的例子中，也许最好是追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的起源，这次起义的影响和后果是如此地具有破坏性，以致可以说它是一次“具有特征性的革命”，是“儒家中国的末日的开始”。<sup>①</sup>而且，尽管共产党在 1949 年取得了胜利，但革命时期却一直延续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1966 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 10 年，是中国政治中含有持续革命

---

<sup>①</sup> 弗朗兹·迈克尔等著《太平天国起义》第 1 卷：《历史》，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第 199 页。

特征的一个明显证据。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坚定地认为这场战役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宣传家事实上也称它为“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sup>①</sup>没有必要去讨论这种说法准确与否，但它确实表明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sup>②</sup>

在局外的观察者看来，中国政治的革命背景既是迷人的，又是令人困惑的。中国文明的丰饶和力量长期以来特别令局外人着迷。如今，在此之上又添上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人类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于现代中国，并且仍在演示着。然而，无论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如何，对于革命政治切不可作出轻率的理解和概括。在本章后面，我们将讨论围绕着如何解释中国革命而展开的辩论，但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先要在这里提一提。

首先，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自然是革命的实质。显而易见，现代中国政治是不稳定的，在革命进程中，政治和社会变革是如此之迅速，以致关于某一个时间段的那些描述，对更长的时期来说往往是不正确的。这些变革怎样经常地推翻人们所设想的关于中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许并非显而易见。让我们考虑一下最近几十年中至少是某些观察家所坚信的若干观点吧。人们在各个时期持这样一种看法：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家庭本位的社会取得成功；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坚定盟友；意识形态的联系使得中苏联盟不可动摇；中共的权威不可能受到来自内部的严重威胁；美国与中国在50年代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中国永远也不会欢迎外国在其国境内的经济活动。所有这些命题在一段时间内曾经颇有道理，但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教训在于：要分析革命的时代，就应特别注意考察这个时代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智慧。

其次，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将许多差别转变成成为政治性的和关于人类生存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容忍异议”的协议并非不可能达成，但这也许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也要承担风险。当政治斗争的结局无论对个人前程还是对社会的长期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时，那些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野心和理想的斗争参加者，将会毫不犹豫地突破

---

<sup>①</sup> 《北京周报》英文版第42期（1968年10月18日），第26页、31页。

<sup>②</sup> 确实，邓小平把1978年以后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见《北京周报》（1985年4月8日）第6版。然而，我们把毛泽东的去世看作是革命时代的结束，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并不具有通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的特征。对毛泽东以后政治这一革命后特征的深刻的分析，见洛韦尔·迪特默尔《毛泽东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载《亚洲观察》第24卷第3期（1984年3月），第349~369页。

游戏“规则”。到那时，武装力量的使用或威吓在政治过程中就成了核心的问题。正如中国在1911—1949年间的全过程中所表明的那样。1949—1958年间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作用的减弱是革命政治衰落的一个具体迹象。自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作用的提升——先是象征性的，然后是一种威慑力量，直到最终形成与其他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相对抗的阵势——同样是革命复活的一个具体例证。到8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了其“后革命时代”，军队的政治作用处在1949年以来、也许是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最低潮。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老生常谈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即资料来源和证据确凿的问题。要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动态状况的知识并非易事。我们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大部分（当然并不是全部）取自共产党的正式文献，这自然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和限制。这并不仅仅是由于1949年之后中共力图维持一个封闭的传播体系，或许在任何一种革命形势下，可靠资料的产生和保存工作都会困难重重。原始材料也许已丢失、毁坏或是封存了；关键事件的参与者也许会保持沉默；独立的资料来源也许遭到了压制，而官方的消息显然带有宣传的性质；让学者和官员获取资料的问题，总的说来并不受到重视，而且在一个被内部战争和革命搞得支离破碎的社会，获取资料也是极其困难的。

1976年以后，中国的出版物和资料在量和质上都有了提高。由于这样一种趋势，也由于对外国旅游者和居民的更大开放以及给予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更大的机会，现在已经有了从各个来源和角度产生的关于中国的多得多的信息。然而，在有关现代中国政治的各种资料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矛盾，这些空白和矛盾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应当如何使用来自中国出版物以及中国大陆移民、外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来源的那些原始材料。<sup>①</sup> 要研究中国政治，仍然必须清楚地看到资料来源的限制，看到这一问题如何影响对这个课题本身的解释。

## 历史背景

发生中国革命的那个社会，其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特质与长期性已人所

---

<sup>①</sup> 见 M. 奥克森伯格《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资料来源和方法论问题》，载 A. D. 巴内特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577～606页；以及艾米·威尔逊编《中国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纽约，1983年。

皆知。在本书第二章，我们将考察中国政治传统的特征何以影响革命的历史；而在此则指出这种传统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之重要以及其未来的前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印象往往带有不可捉摸的微妙性质，但是有关中国的这些印象的重要性则是一清二楚的。确实，在现时代，这些历史印象一再导致人们对中国的影响和能力的夸大估量。这些印象曾表现为一种危险的妄自尊大，清朝皇帝曾以这种态度对 18 世纪晚期开始的日益增大的西方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或许西方旅行者和传教士也同样被误导了，他们曾预见，在商业或宗教上征服中国将可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产生了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虚幻的印象。冷战中的美国人惧怕中国对东南亚的独占，对非洲的影响或是对北美大陆的军事威胁，这种恐惧乃是产生于对想象中而远远不是现实的中国力量的估计。中国人也试图赋予自己的行动以全球性的重要意义，正如前面引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政治宣传自然而然地夸大了希望和恐惧，但中国的传统仍然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发生重要的影响。

从更实际的方面看，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必须参照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笼罩着中国政治的进程。中国人的概念框架令人惊异地具有自我中心和历史的特性。诸多比较主要是与历史的比较，——与封建王朝、与国民党、与“解放前”、与“文化大革命前”、或是“四人帮之后”比较——而不是与其他制度比较。他们利用著名历史人物来与当代英雄和坏人作类比，从历史和文学传统中借用了许多例子和作比喻的形象。

这种在当代政治进程中加进历史因素的做法，部分是出于一种文化特质，部分则是由传统体制的封闭性和相关性所造成的。直到最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是 1911 年清朝覆灭之前出生的。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僚对清朝帝国社会有着切身的感受，并部分接受了传统方式的教育。较年轻些的领导人是 1949 年以前从政的，也很了解 1911 年以后长期维系着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形态。简言之，历史背景仍然提供了评估当代事项和目标的参考点。

## 国际背景

国际背景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第三个优先考虑的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使它成了世界第三大国，其人口（1984 年底为 10.36 亿）是世界上最多的，约占世界人口的 1/5。1949 年以后的经济增长

从积累来看是高的，尽管有6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官方统计数字记载了从1952年到1982年的下述年平均增长率（百分数）：国民收入6.0；人口1.9；社会总产值7.9；工业总产值10.7；农业总产值3.8。由于价格和计算上的差别，外国观察家通常降低中国的工业产值，从而降低了它的总体增长率。然而，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1980年仍增长了4倍多。到80年代初，它已经成为第三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在全世界占第9位，在它前面的只有7个工业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苏联。<sup>①</sup>一位学者指出，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看作大致相当于20年前的日本和苏联的经济。<sup>②</sup>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温度区域的南北大跨度，地理形态上的多样化，丰富的矿产和能源，使它具有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主要力量的潜力。任何预测都是有风险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将实现这种潜力。<sup>③</sup>

中国的领土占了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它与苏联、巴基斯坦、印度、越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接壤，并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为邻。它占据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集中居住着世界的众多人口。从外交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1年起就是联合国和它的安理会的成员国；到1983年，它与1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超过400万人，其中军人占了300万人以上。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一颗核装置，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导弹发射能力在增长，尽管还落在超级大国的后面很远。中国是个地区性大国，潜在的全球性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1978年12月美国对它外交上的承认，为它完全加入国际社会移去了最后一个正式障碍。

上面是对中国的国际背景的一个十分简化的看法，它强调这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份量。这种观点必须由以下几点来作补充。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反映它的绝对值，而不是它的发展水准。尽管有着高增长记录和30

---

① 世界银行《1983年全球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52~153页。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某些较高估计认为它超过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使它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国。

② D. H. 帕金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后果》，载R. H. 所罗门编《中国因素》，普林梯斯—霍尔出版公司1981年，第115~117页。

③ 见以上引书，并可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一部分》，华盛顿GPO1982年；特别是R. F. 德恩伯格《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寻求自足的增长：一种估价》，第19~76页，以及阿瑟·小艾斯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与长期表现》，第99~118页。

年的快速工业化，但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它仍然严重地依赖于其农业部门。按人均国民总产值（约400美元）计算，它仍然处在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而且，它的食物—人口平衡是不稳定的，从而使发展战略问题复杂化了。其基本问题在于，仅有50%的土地适合农业耕作，而大部分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0%）集中于中国全部土地中1/6的良田上。为了支持工业化和养活全部人口，中国必须保持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它已经这样做了，但所超过值很小。在60年代的危机时期，人均谷物产量远远低于50年代的高峰水平，直到70年代末才达到新的高峰。近年减低的人口增长率（1983年和1984年均为1%），以及1976年以后由于采取新的农业政策（“承包责任制”）而大大促进的农业生产，都有助于使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这些趋势减轻了食品—人口平衡问题的压力；当然，假如连年歉收或再来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仍然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食品短缺。无论如何，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需要农业技术的革命。当前通过增大对农户的物质刺激来促进农业增长，这种努力并没有结束如何将技术改造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起来的争论。

中国的未来发展还有其他一些麻烦。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有可能破坏在国家控制之下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模式。交通和住房落后于其他方面，此外，中国尽管在能源方面有惊人的潜力，但却一直存在能源短缺。科学和技术的落后是未来经济和军事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80年代中国所采取的发展战略越来越依赖外贸、技术和资本，这就向中国的政治上层人物提出了微妙的政治问题。臃肿的官僚机构倾向于保持低效率和抗拒变革。简言之，中国在世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发展将轻易实现、自然发生，或不再具有严重的内部紧张和冲突。

其次，当前中国跟国际体系的合作，与它对过去的国际冲突和不安全感的体验形成了反差，这些冲突和不安定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的一个特色。在整个50和60年代，它把美国看作是对它的安全的主要威胁。由于美国卷入了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由于美国与日本、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澳美新条约国等国家建立的军事安全条约，也由于美国人包围和孤立中国的种种做法。美国的支持使得台湾政权一直到1971年还在联合国占据中国的席位，并得到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外交承认。与印度的严重领土争端导致1962年的短期边界战争，随后便是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多年紧张关系。在60年代，中国人强烈地担忧日本的再度军事化。最重要的是，1960年以后中苏冲突的加剧使得中国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潜在目标。1969年与苏联的边界交火，使苏联突出地

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并且成了导致中美两国在70年代重新接近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此以后，特别是自从毛泽东1976年逝世之后，随着主要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和贸易的稳步增长，中国的外交关系表现得更为和平（主要的例外是中国与越南的边界冲突）。

然而，中国相对孤立和不安全的先前那段时期仍然是重要的，其部分缘由是它使自力更生与影响了政治上一代人的革命好战情绪相结合，部分则是因为某些特定的争议悬而未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对台湾、印度和苏联边境地区以及东海和南中国海的群岛提出未决的领土要求。对这些争议地区的军事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从长期的预测来看，却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作为一个力争赶超的军事落后的大国，中国对国际限制军备和核试验的条约持怀疑态度。它的对外贸易仍然相对薄弱，正如1983年400亿美元的估计外贸数字所表明的那样，而同期台湾的外贸额估计为450亿美元，香港则为350亿美元。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中苏关系的改善并未结束对中国北部边境安全的威胁。在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大地低于苏联的实力，因此，在国内和对外政策上，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仍然具有高度的优先性。

最后，如果认为中国已加入“国际俱乐部”，那是有悖于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革命力量的形象的，这种形象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主导了中国人自己和外国人的看法。在这些年里，中国越来越表现出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是世界权力结构的自觉反对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取代西方和苏联发展模式的一种新选择，中国内部毛泽东主义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里不准备评价毛泽东主义模式的特异性<sup>①</sup>，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应注意到，中国人自己和许多外国观察者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看作是超级大国世界的反对者和明确的取代模式——一支必定要向现存秩序挑战而不是迁就它的追求激进变革的力量。这种形象使现任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复杂化了，自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之后，他们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以追求国家安全和获得继续发展所必需的国外贸易、技术和资本。

革命的、历史的和国际的背景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不管是初学者

---

<sup>①</sup> 作为有关毛泽东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异性和移植的可能性的争议的一个例子，见约翰·戈莱《中国的经济和毛泽东主义战略》，纽约《每周评论》1976年；M. 奥克森伯格编《中国的发展经验》，纽约，1973年；R. 特里尔编《中国的差异》，纽约，1979年；D. 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中的毛泽东》，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

还是老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中国革命时代变革的广度和速度,同时又得认识它与植根于中国两千年帝国秩序中的那些模式的联系,必须考虑中国人和外国人有关这场革命的那些文献资料中存在的派别之见,同时又要使用这些实质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必须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中惊人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与棘手的问题和落后面并存;必须思考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寻求安全和支持的努力,尽管它试图改造这种秩序并避开其局限性;还必须理解中国朝向或者脱离毛泽东主义、苏联和西方发展模式概念的运动的辩证法。这些挑战加强了在这个课题的迷人性质,并有助于解释,围绕着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究竟应强调哪些问题和哪些模式这一议题,外国观察家何以展开过这么多的辩论。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当学者们试图追踪中国革命和革命以后富有挑战性的现实时,这种围绕问题和模式的辩论何以一直在变化着。

##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

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争论和对它的总结是围绕着与它的历史有关的问题,乃至对于这个新政权的定性问题而展开的。这种历史导向有许多理由。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在这一领域中的政治学家却相对寥寥。由于共产党政府的新颖性和有关它的信息的不确切性,人们不大愿意对1949年以后的事件作彻底的考察。就美国人而言,拒绝与中国大陆接触,老是盯着中国何以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这些问题左右了政治的思考。有段时间,所有这些考虑都失去了它在某些方面的吸引力,直接针对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研究开始迅速发展。然而,关于共产党的性质的争议过多地依靠1949年以前的资料和文献,这种倾向曾垄断了早期总结共产主义制度的尝试。这种争议大致分为三个主要的论题或争论点:毛泽东主义的独立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中国与外国影响;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根源。

### 毛泽东主义与正统思想

关于“毛泽东主义”的争论是围绕中国共产党政治而展开的最明显的、充满异议的和持久的辩论。当《中国季刊》(这是西方首屈一指的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刊物)在1960年开始出版时,“毛泽东主义”是该刊头两期两篇

主要文章的论题<sup>①</sup>；这种选择恰恰表明了它看起来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论题。这里不去陈述这位或者那位个别作者的具体论点，而只是简单地摆出这场辩论中的一般倾向。赞成“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的人认为，由毛泽东领导体制所规定、并由他的著作所阐述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其形式是独特的、叛道的或异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独立于莫斯科。那些赞成中国“正统”而不赞成“毛泽东主义”提法的人则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战略多远，他们觉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依赖于莫斯科。当然在事实上，这场辩论是十分复杂而艰难的。而且正如上述简化了的说法所表明的，它提出了对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政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同莫斯科没有密切联系的革命者呢，抑或他们不过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一种运动的中国分部的领导人？

中苏冲突解决了有关中国政治独立性的问题，支持了“毛泽东主义”的观点。尽管在50年代俄国人对中国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表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在西方也普遍地把毛泽东主义（中国人自己绝少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当作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独特分部的最恰当的术语来接受。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义的胜利自然加强了那些强调它的1949年以前的根源的人们的观点。<sup>②</sup>然而，关于毛泽东主义的辩论仍然在两条广阔的阵线上展开。第一，对毛泽东早期偏离苏联学说的确切时间和程度仍然有争议，争论集中于1927—1935年间革命战略的复杂细节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sup>③</sup>第二，目前正在开展的究竟谁是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讨论，是近期内更引起人们兴趣的论题。假定在中国和俄国共产党人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重要差别（目前已经看不到像过去那样否认这种差别的情况了），那么，是毛泽东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更符合其

<sup>①</sup> K. A. 惠特福格尔《“毛泽东主义”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1、2期（1960年1—3月、4—6月），第72—86、16—34页；以及B. 施瓦兹《关于〈“毛泽东主义”传说〉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2期（1960年4—6月），第35—42页。

<sup>②</sup> 对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绝妙考察，见S. R. 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修订版，纽约，1969年，还可见于B. 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基础，1917—1935》，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2年。

<sup>③</sup> 例如见萧佐良（Hsiao Tso-ling）《中国共产主义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I. J. 金《中国共产主义政治：江西苏维埃》，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J. E. 鲁《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1927—193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S. 斯瓦鲁普《1927—1934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以及R. C. 索恩顿《1928—1931年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